

吴翔宇 著



20世纪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 “鲁迅形象”研究

The Study of Lu Xun's Imag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20th Century China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1062）的最终成果

吴翔宇 著

20世纪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 “鲁迅形象”研究

The Study of Lu Xun's Imag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20th Century China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 / 吴翔宇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2

ISBN 978 - 7 - 305 - 18140 - 5

I. ①2… II. ①吴… III. ①鲁迅研究 IV. ①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714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

著 者 吴翔宇

责任编辑 卢文婷 田 雁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4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5.5 字数 260 千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8140 - 5

定 价 5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翔宇教授刚在九州出版社出了一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没过一月，又送来一本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成果《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的书稿。他的勤奋是我了解的，但如此丰产还是让我感到后生可畏。2010 年迄今，他已出版了三部鲁迅研究的专著，另外还有一本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他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专著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这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重点研究鲁迅的时间观念及其文学世界的体现，从思维范式的方面观照鲁迅文学实践的风格。后来他参与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研究”，开始从形象学的角度来审视鲁迅。其第二本专著就是《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今天这一本《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可以说是他从形象学的思路来研究鲁迅的又一个重要成果，与他的第二部鲁迅研究专著构成了姐妹篇。

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鲁迅及鲁迅研究与 20 世纪中国的巨变息息相关——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创作代表了“五四”文学的最高成就，深刻影响了新文学和现代思想的发展；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鲁迅为左翼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牵扯出了左翼内部的复杂矛盾；共产党人后来推崇他，鲁迅研究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关于鲁迅研究的突破或者争论，常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变革的先声。在此过程中，鲁迅的形象不断被改写，其中包括极“左”政治对鲁迅形象的扭曲，折射出了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重大问题。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把 20 世纪巨变的历史与历史巨变中的卡里斯玛典型鲁迅联系起来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评价鲁迅，更重要的是对与鲁迅有关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革命史加以系统梳理，还原历史一个真相，并对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论问

题和实践问题做出科学回答,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推动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翔宇教授的鲁迅研究,显然遵循了这一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它是审美的批评,是对鲁迅精神的审美思考和对鲁迅作品的艺术欣赏,但又超越了一般的审美,深入到了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即从鲁迅创作和战斗所构成的“形象”来透视 20 世纪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

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侧重于通过鲁迅小说来透视 20 世纪的“中国问题”,而《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则注重 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鲁迅形象”的生成、嬗变、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后者涉及的其实就是与鲁迅密切相关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在时代的洪流中交流、碰撞乃至对抗,而这些对抗,大家不难明白,事关中国及中国革命的重大主题,甚至决定了一些人的终身命运。这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比如对启蒙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的变奏这一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课题,从鲁迅及鲁迅的传播,可以触及其核心的内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今天仍在进行和深化之中,因此这一研究同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多年研究对鲁迅逐步加深了解的基础,翔宇教授在这本专著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并给予细致的解释,与他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对照起来,不是重复,而是深化和拓展,让作为读者的我感到欣喜。

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个人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和发言,不可能道尽研究对象的全部秘密。对鲁迅这样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文学家来说,鲁迅研究尤其是一个与时俱进、常说常新的话题。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解释 20 世纪历史、探索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许多知识分子进行灵魂自救的一个心灵偶像,他会不断地被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精神发现。因此,翔宇教授的鲁迅研究,是一个年轻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探索,它本身是开放的:既有待于继续深入,又期待学界的批评——批评,正是砥砺思想、促进学术发展的动力!

陈国恩

2017 年 1 月 15 日写于珞珈山寓所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文化语境与“鲁迅形象”的关联	013
第一节 “源形象”与“形象流”的辩证	013
一、复杂的鲁迅与鲁迅形象的规定性	014
二、误读的鲁迅与鲁迅形象的流动性	020
第二节 “定型”与“转型”语境的形象体系	025
一、民国机制与鲁迅形象的阐释空间	026
二、转型语境与鲁迅形象自我化	030
第二章 鲁迅形象的生成：被召唤的现代文学传统	037
第一节 “自塑”与“他塑”共构的公共形象	037
一、自我言说与鲁迅形象的印证	038
二、他者塑造与鲁迅形象的映像	048
第二节 文化选择与鲁迅形象的生成脉络	060
一、“前鲁迅”与鲁迅形象的孕育	060
二、“成为鲁迅”与鲁迅形象的出场	067
三、“后鲁迅”与鲁迅形象的显隐	073
第三节 精神谱系与鲁迅形象的文本映照	080
一、“孤独者”家族与“启蒙鲁迅”的遇合	081

二、“中间物”意识与“绝望鲁迅”的突显	086
第三章 鲁迅形象的传播:对接的认同与疏离	091
第一节 “学鲁迅”与鲁迅形象的正向传播	091
一、“鲁迅门人”与鲁迅形象的重构	092
二、“鲁迅遗产”与鲁迅形象的延传	100
第二节 “批鲁迅”与鲁迅形象的反向机制	118
一、论争语境与鲁迅形象的批评姿态	119
二、“反鲁”思潮与鲁迅形象的抑扬	126
第三节 现代传媒与鲁迅形象的知识化生产	135
一、媒介机制与鲁迅言路的扩展	136
二、社会问题讨论与鲁迅公共形象的深化	141
第四章 鲁迅形象的嬗变:深刻的丰富与复杂的统一	151
第一节 “启蒙先锋”:错位语境下的“孤独者”	151
一、启蒙的逻辑困结与鲁迅形象的思想基质	152
二、“弱者启蒙”与新人想象的困局	155
第二节 “左翼旗手”:自由与不自由间的“横站者”	160
一、思想分期的论定与“鲁迅的左翼”形象构建	161
二、大众化实践与“左翼的鲁迅”的际遇	164
第三节 “鲁迅方向”:鲁迅形象经典化的组织和疏离	170
一、新民主主义框架下的鲁迅形象整合	171
二、“纪念鲁迅”与鲁迅精神资源的聚合	176
三、文艺新方向的确定与鲁迅形象的经典化运作	183
第四节 鲁迅形象的“再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195
一、新启蒙语境与鲁迅形象的重建	195
二、世俗化语境与鲁迅形象的认同危机	202
第五章 鲁迅形象的确认:效应与反思	208
第一节 鲁迅形象利用的正负效应	208

一、“民族魂”与鲁迅形象范式的确证	209
二、“神化”鲁迅与鲁迅形象被利用的危害	212
第二节 鲁迅形象的价值融通与确认	217
一、“鲁迅传统”与鲁迅形象的超越性	217
二、“回到鲁迅”与融通鲁迅资源	220
结语	224
参考文献	228
后记	237

绪 论

当前,在反思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时候,“鲁迅形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它是关涉文学传统建构与延传的重要关节点,围绕着此话题会牵扯整个学界的知识化生产,进而拓展到社会各个层面。由鲁迅形象这个“点”能勾连现代中国语境中诸多纷繁复杂的“线”、“面”,借此搭建出充满动态的“文化生命体”。基于此,我们应在考察鲁迅精神资源认定的尺度、建构的路径及当下反思等关键要素的基础上,廓清鲁迅形象建构与现代文学中精神现象的复杂关系。立足于当下的时代语境,进一步开掘鲁迅精神资源中的思想精华和合理质素,为创构具有现代品格的中国文学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作家,鲁迅的思想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出路血肉相关,其辐射力早已超越文学领域,成为同时代学人及后人不容忽视的精神资源。围绕着“鲁迅形象”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一些成果,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思“鲁迅形象”本质化的倾向。“鲁迅形象”的确认是其之于中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伟大意义而建构起来的,脱离了这一文化语境或政治生态来谈论此议题,显然难以拓展其文化内涵及思想深度。但是,过于看重政治语境的塑造之功又有可能固化甚至曲解鲁迅形象,造成对精神资源的误解和浪费。鲁迅形象是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一个不断被阐释与塑造的文化符码,从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始,鲁迅形象就这样或那样地“被”阐释。然而,在不断的阐释过程中,难免出现“误读”,原初的鲁迅形象似乎越来越遥远。围绕着鲁迅形象形成了一个交织着权力话语、思想冲突的话语场,鲁迅形象的认知与阐释勾连着中国新文学演进中诸多重要理论问题,必须给予科学的认识和分析。以往之所以会形成对“鲁迅形象”的误读,一是作家身份的单一政治认同,政治的涨落确定作家的评定,产生过“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的曲解现

象；二是脱离文化语境的单向思维模式，简单地附和时评效应、气候背景，对变动的“鲁迅形象”缺乏整体观照，出现过本质论和绝对论的误读倾向。因而应将其置于 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动态结构中予以观照，将历史还给历史，客观公允地“回到鲁迅那里去”。

可以说，鲁迅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认定是通过其之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伟大意义而建构起来的。然而“本质化”的鲁迅方向和思想资源的认定简化了现代传统对当代文学影响的复杂性，使得鲁迅形象在当代阐释中逐渐强化“鲁迅的红色”^①，铸就了“大鲁迅”^②形象。鲁迅传统往往和“五四”传统乃至现代传统等量齐观，难分彼此。对于鲁迅的本质化的阐释，汪晖指出，这种研究粗暴地将鲁迅形象从文学史、思想史的畛域中剥离出来，并抽象为一种政治规定，从而确定了后来鲁迅研究的基本范式。^③其后果是，“绝对”的标准斩断了鲁迅精神与现实生活的对话关系，这种政治规定简化了鲁迅思想资源的评定规则，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因此也就被弱化了。受此影响，研究者只要从鲁迅的这种精神内涵中抽绎出符合政治意义的一缕，在其多元复杂的思想体系中离析出一个既定的框架，就是言之凿凿的走近鲁迅、言说鲁迅。对于汪晖的上述阐释，辛平山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汪晖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给予鲁迅形象的影响不仅涉及毛泽东的评价，也涉及鲁迅本身。在他看来，鲁迅一贯的革命追求与革命意识形态是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那种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的研究是对“鲁迅传统”的拒绝与否定。^④确实，当文学与政治相遇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微妙，文学批评既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也不能完全与政治意识形态脱节。回顾鲁迅的研究史，要么将鲁迅研究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要么将鲁迅研究完全视为与中国现实社会无关，这两种现象实质上都将鲁迅研究本质化了。程光炜梳理了近几十年出版的关于鲁迅的著述，发掘了鲁迅研究被“本质化”的深刻根由：一方面，它说明大多数人确实是把鲁迅当作自己人生的导师、精神领袖来崇拜的，因此一旦国民党设置的禁区被打破，这种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崇拜之情便如山

① 陈漱渝：《鲁迅的红色、灰色和本色》，《鲁迅研究月刊》2011 年第 9 期。

② 张福贵：《经典化理解：当下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主题》，《鲁迅研究月刊》2004 年第 7 期。

③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 年第 6 期。

④ 辛平山：《究竟要塑造什么样的鲁迅形象？——评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90 年第 6 期。

洪暴发般地喷涌而出；另一方面，也不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肯定与褒扬“鲁迅精神”的心理动机。新中国成立后，凡是拥护文化政策者都被视为“进步”，而鲁迅既然被这一文化政策看作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典型和榜样，那么，研究鲁迅自然就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具体表现；最后一个方面，出于一种知识者天真的幻想，幼稚地以为意识形态体制真的信奉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他在对旧文化批判中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许多研究者显然是在心理层面上把鲁迅作为他们维护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精神最后一道无形的“屏障”^①。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周扬、陈涌、唐弢等人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研究鲁迅，所受的精神禁锢诸多，思想定于一尊。这种研究实质上是用政治规定的合理逻辑来确证鲁迅精神品格的思想效应，虽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直接构成了时局的组成部分，但回避了鲁迅思想资源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不少成果体现的是政治意向，而不是学术的意愿。王富仁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就是对这种思维的一种修正，反对用政治思维模式来研究鲁迅，其意义其实主要还是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即在思想解放等宏大历史叙事方面。这些成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站在不同政治文化立场上对鲁迅的一种理解，鲁迅的丰富性也经得起这样的多种理解。

与此相反，也有一些人用解构的手笔，剥离附加在鲁迅身上的神圣光环，着力再现一个可亲近的“小鲁迅”形象。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拉近了鲁迅与当下人的距离，从“言必称鲁迅”回归鲁迅本身。然而，这种集中于“鲁迅的灰色”的批评倾向容易滋长毫无根据的庸俗化解读，在恶搞的快感中降低了鲁迅精神资源的思想高度，造成了精神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教训是深刻的。为此，王富仁指出：“我反对把鲁迅还原为普通人的倾向，刻意把鲁迅世俗化、变成庸俗的好人以使人们对他感到亲切，这样的还原是在扼杀和庸俗化鲁迅。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形象，他首先是一个战士、批判者、关心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痛苦挣扎的形象，一生追求正义，说真话，不怕得罪人。假如不是这样的鲁迅，鲁迅就毫无价值。”^②

第二，论析鲁迅形象“重构”与“再叙”的路径。鲁迅形象的传播是在他人的重构和再叙的路径中完成的，这其中既有鲁迅的弟子、亲友，又有政治权威、文学

① 程光炜：《“想象”鲁迅——当代的鲁迅研究及其他》，《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② 王富仁：《我反对把鲁迅还原为普通人的倾向》，《信息时报》2010年4月4日。

史家、文学研究者、普通读者。徐妍《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①梳理了鲁迅是如何从新时期以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的过程,知识分子在重返自我的道路上,鲁迅世界中的启蒙精神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变迁存在着契合和冲突的关系,而正是在这种冲突与互动中鲁迅形象才得以重构。李新宇以某个特定年份“鲁迅”的命运与传播为切入点,深刻地分析了鲁迅逝世后复杂的人事纠葛和文化生态。《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鲁迅与当代中国”研究之一》全面考察了鲁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的经过,在他看来,鲁迅之所以能登上神坛,与当时具体的情境有关,“宣传哪些,抬高哪些,放大哪些,却必然要做出选择。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鲁迅再造工程,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首先是两项:一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二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②。在《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一文中,他指出,在当年对胡风的批判中,鲁迅成了一个缺席的被批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精神的命运。但从文化表层考察,情况并不是这样:胡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鲁迅却依然铭刻于中国文化的旗帜中,这其中包含了复杂的历史内容。^③张均的《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认为,有关鲁迅思想阐释及“鲁迅”形象的重构,是新中国成立初年文化再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键当事人,鲁迅弟子出于位置不同、对鲁迅精神理解与继承方式的差异,在其内部酿成两个“鲁迅”相冲突的理论争辩。它从胡风、雪苇等对冯雪峰等的不满开始,以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出版为标志。^④鲁迅逝世后,鲁迅传统的经典化传播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改造而实现的。杨海燕撰文认为:“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⑤

① 徐妍:《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李新宇:《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鲁迅与当代中国”研究之一》,《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

③ 李新宇:《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文史哲》2009年第1期。

④ 张均:《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⑤ 杨海燕:《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齐鲁学刊》2011年第2期。

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尽管没有从“形象学”的角度梳理中国鲁迅研究的具体形态,但他以史为经,以鲁迅研究的成就与局限为纬,为我们建构起了隐性的鲁迅形象谱系。同时,在“鲁迅”这一文化符号与知识分子命题的互视中,勾勒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行进轨迹,而鲁迅观念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于是,他提出这样的观点:“鲁迅是在与各种不同文化思想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仅仅学理的研究不足以挖掘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内部潜力,甚至也无法真正读懂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研究者真正进入了同鲁迅一样的思想追求过程,我们才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不断变动着的社会体验、思考研究他的作品。”^①钱理群的《远行之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1949)》详细地介绍了鲁迅逝世后,国人对“鲁迅”这一丰富存在的解读、研究及接受的过程,在他看来,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鲁迅应将鲁迅研究与当前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我们今天面对着先驱者未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只是‘接着鲁迅往下说’已经不够了,相反,应思考鲁迅所达到的极限,并进一步寻求新的突破与新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只有把批判的精神实施于鲁迅自身,才有可能有独立的批判的‘鲁迅式的,甚至超越鲁迅’的知识分子。”^②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确实是一位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均有不同接受的精神资源,这就要求现代的知识分子去解读鲁迅时既要体察鲁迅批判性本源的特质,又要突破“鲁迅”这一存在的知识框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独立的批判眼光来重构鲁迅。此外,潘磊的《“鲁迅”在延安》、葛涛的《鲁迅的文化史》都从传播和接受的视野梳理了鲁迅形象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个政治区域的塑造状况,以此来审视这种塑造和重构所潜藏的深刻话语形态。

事实上,造成上述“文学家鲁迅”研究薄弱的根源在于鲁迅精神资源认定时过于强调显效的社会功用。值得注意的是,较早对鲁迅精神资源进行整合认定的人是毛泽东,他对“鲁迅方向”^③的确认,使得鲁迅形象从纯粹的思想史、文学史的层面抽象为一种政治规定,从而确认了“鲁迅的政治学”或“政治化的鲁迅”传统。这种政治规定强化了鲁迅的政治学意义,却简化了鲁迅思想资源的评定

①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② 钱理群:《远行之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1949)》,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8页。

规则,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因此也明确了。在这一点上,很多学者有相同的见解。张福贵指出,鲁迅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的研究,而是对其人其文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①汪晖也指出:“鲁迅形象是被中国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说,那以后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他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②

第三,梳理鲁迅传统的精神延传轨迹。鲁迅的思想倾向、写作技巧以及精神资源,作为一种传统在他去世后对中国文学有持续的影响力。正是这种“延传”使传统能够持续得到更新,也使得鲁迅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温儒敏、陈晓明等人所著《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的第八章“鲁迅的当代命运”分别从鲁迅传统的生成、毛泽东对鲁迅传统的重塑、鲁迅精神苗裔的当代沉浮等方面梳理了鲁迅传统在当代中国行走的路向,发掘了鲁迅传统的顺向传承与反向背离的现象,并分析了这种路向的各种原因。^③鲁迅不仅思想走在时代前列,其文学创作的形式、技巧也曾引领文坛风尚,就其“新编故事”的技法而论,跟随者诸多。对于这种现象,姜振昌撰文认为,《故事新编》以愤世嫉俗的强烈讽喻性构成自己的美学力量,其跨越时空、古今指涉的艺术意蕴,主要依赖于“杂文”意识的渗透,小说的作意和文体,在整体上都富于杂文意识。中国“五四”后的新历史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到“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故事新编》都有割舍不断的承传关系。它们也每每生发出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艺术经验。^④吴秀明、尹凡同样以《故事新编》为原型,从历史小说的文体学角度切入,将这种新历史小说称为与鲁迅创作异同并呈的“新故事新编”,鲁迅小说中的“油滑”,戏拟,对历史人物的揶揄以及由历史对现实的隐喻等

① 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1 期。

② 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1 页。

③ 温儒敏、陈晓明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姜振昌:《〈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创作手法,在这些“新故事新编”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发扬。^①王彬彬着力于研究当代先锋小说作家的鲁迅气质,他认为鲁迅的许多小说,其意旨与残雪、余华小说都有很相近之处,如《狂人日记》和《山上的小屋》、《四月三日事件》可以形成比较的阅读关系。但残雪、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这两位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溢恶,之所以那样冷静、从容地描写着人类之恶,是因为已经把恶当作不可改变的既存事实接受下来了,是因为已经认可了恶的合理性和永久性。而鲁迅在描写人性之恶,对人类未来失去希望的同时,仍坚持拒绝承认人类的现存状况是合理的,即使明知人类无法改良,也要硬着头皮去做,在“绝望中抗争”,这便是鲁迅的伟大之处。^②耿传明从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对余鲁二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余华以一种“人之死”的后人道主义观念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话语进行了反思和颠覆,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人的观念”质疑了现代式的“启蒙虚妄”和“理性神话”^③。葛红兵用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讨论了鲁迅和莫言小说中的言语和发声问题,他认为鲁迅选择的是“西方式的启蒙主义发声方法”,是一种“个人化的知识分子气的发声方式”,相反,那种活跃在民间的、喧腾的、撒欢的、顺畅的、平面的大众化发声方式并没有被鲁迅接受,而莫言正是对鲁迅发声方式的反拨。他的《檀香刑》可看作对《阿Q正传》的戏拟,但运用的是一种反启蒙的言语方式,是一种没有受到“五四”启蒙话语熏染的,来自民间的、狂放的、暴烈的、血腥的、欢腾的“前启蒙”语言,这种“前启蒙”语言把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改造后受到遮蔽的声音再次发掘了出来。这无疑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对鲁迅的启蒙现代性的解构方式。^④

第四,审视鲁迅阐释中的酷评现象。一般而论,一种精神资源的接受和阐释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对于鲁迅形象的评判亦如此,毁誉参半一直伴随着鲁迅

① 吴秀明、尹凡:《“故事新编”模式历史小说在当下的复活和发展》,《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王彬彬:《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③ 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④ 葛红兵:《文字对声音、言语的遗忘和压抑——从鲁迅、莫言对语言的态度说开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对于自己形象的概括,鲁迅始终有一种反言说的思维,他始终抱着“料不到究竟怎样”的态度:“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之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①他甚至劝诫青年们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的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②鲁迅的反描写意识并不能阻止后人无休止的言说,在一片赞誉之声之外,对于鲁迅的批评甚至诋毁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歇,这其中,20 世纪末新生代作家对于鲁迅的“全面开战”尤其引人关注。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情绪化地认定鲁迅所开创的传统已经过时,以其为首的中国新文学在当下世俗化的大潮中早已失去了立足之地,因而鲁迅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对于这种现象,很多研究者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来检视和融通鲁迅传统。王富仁指出,不能因为鲁迅某些方面的缺陷来全盘否定鲁迅,否则就会消解民族前进的精神和动力。^③高旭东则指出:“能对鲁迅说三道四、评头品足虽然是一种学术自由的表现,但学术自由是既有颠覆鲁迅者的自由,也有颠覆颠覆鲁迅者的自由……因此,对于 21 世纪中国文学而言,重要的不是怎样颠覆鲁迅,而是更深入地学习鲁迅并争取超越鲁迅。”^④针对那些打着后现代旗号恶意诋毁、攻击鲁迅的言说,王卫平指出,这些人立论的逻辑是抛开鲁迅的文学作品来对鲁迅思想、人格、政治态度进行评判,这只能算对鲁迅的态度,而不能算是对鲁迅本体客观理性的求解。^⑤针对“贬鲁”风潮,秦弓认为,鲁迅本体及其意义既然是在不断被阐释中予以接近与接受,那么骂与伐作为一种逆向阐释,也能给我们提供诸多资源。^⑥抛开意识形态作祟,事实上鲁迅的被批判本源于鲁迅本体的丰富性,站

① 鲁迅:《〈阿 Q 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8 页。

②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9 页。

③ 王富仁:《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34 页。

④ 高旭东:《不废江河万古流——对颠覆鲁迅者的颠覆》,《齐鲁学刊》2000 年第 6 期。

⑤ 王卫平:《鲁迅接受中的误读与曲解、攻击和辱骂现象研究》,《三峡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5 期。

⑥ 秦弓:《鲁迅:“华盖运”何时休》,《鲁迅研究月刊》2000 年第 6 期。

在不同立场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能发现并不相同的鲁迅映像,鲁迅形象的内涵也因这种多元性而更好地切近鲁迅本身。

由于鲁迅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其小说对于国民劣根性的鞭挞也是史无前例地执着和深刻,我们不禁要问:鲁迅的该举动会“丑化”中国人或中国形象吗?事实上,鲁迅早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①因而对其鞭挞国民性的举动,他人质疑甚至批判的事实并不意外。如果不辨析批判背后所隐藏的苦用心,看不到鲁迅忧国忧民的思想本质,可能会造成对鲁迅思想观念的误解。对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应考虑鲁迅批判话语背后的重构努力,主张将其批判的立场置于现代中国的转型语境中予以价值重估。温儒敏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正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鲁迅的用心。如果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槃”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正是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转型的前提和动力。^②

上述研究从多方位展示了鲁迅形象的精神内核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有争议的讨论,折射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文化症候。这对于我们认识鲁迅以及鲁迅所处的时代无疑是有裨益的。但是,这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讨论。著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还存在着深入思考的空间。

其一,意识到了“鲁迅形象”的内在生成原理,但未能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文化动态结构之中予以整体考量。“鲁迅形象”的生成与“鲁迅本体”密不可分,也与阐释者和读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以往的研究比较注重开掘鲁迅本体的精神内涵,从中梳理出契合鲁迅本体的形象样貌,进而阐发鲁迅有别于其他知识分子的独特性。这种研究的好处在于并未脱离研究对象去空谈,从鲁迅的性格、行为、思想、人格等方面归纳出具有某种共通性的特质,能抓住鲁迅形象的主导的内核。而缺陷在于容易脱离阐释者所依托或生存的语境,看不到现代中国的剧烈变动是如何进入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的,以及基于语境变化而导致的鲁迅形象的嬗变性。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考察“鲁迅形象”的体认、选择、想象、利用

① 鲁迅:《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 温儒敏:《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